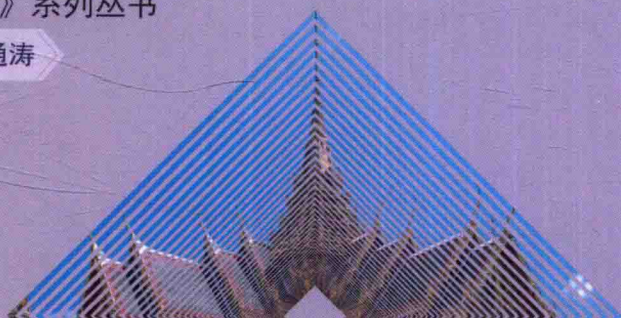


《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系列丛书

主编：郑通涛



THE STUDY ON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PLANNING IN THAILAND

泰国汉语教育 现状及规划研究

陈艳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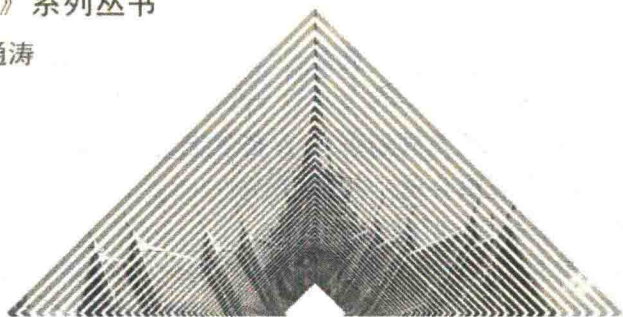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系列丛书

主编：郑通涛



THE STUDY ON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PLANNING IN THAILAND

泰国汉语教育 现状及规划研究

陈艳艺◎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国汉语教育现状及规划研究 / 陈艳艺著. —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6. 1
ISBN 978-7-5192-0728-1

I. ①泰… II. ①陈… III. ①汉语—教学研究—泰国
IV. ①H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3814号

泰国汉语教育现状及规划研究

总 策 划	王颖萱
策划编辑	汪 玲
责任编辑	李玄梅
封面设计	汪 玲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电 话	020-84459702
印 刷	北京天河印刷厂
规 格	710mm×1000mm 1/16
印 章	15.25
字 数	270千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92-0728-1/H·1021
定 价	6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系列丛书总序

郑通涛

国际汉语教育是面向国际汉语学习者的以汉语文化教学为载体的教育实践过程,是汉语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

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兴学科,国际汉语教育虽起步较晚,但跨越国界的汉语教育实践活动则源远流长,历史上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中国语言文化典籍的外传、西方汉学的兴起发展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华文教育等便是最好的明证,也为当今国际汉语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的实践与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

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是人类文明与民族文化的结晶。国外开展语言国际推广教育的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早在15世纪,“语言作为立国的工具”的重要性就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认可。18世纪中叶,西方各国政府都把语言推广看作是“教化属地内有色人种最重要的方式”,也是除政治、军事和经济以外的第四个层面的外交活动。

在当今强调文化影响力等“软实力”的时代,语言的国际教育不仅是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有效工具,也是获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语言的国际化程度已日益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向国外推广本国语言更是成为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战略手段。因而,语言的国际教育就不只是语言的教学和推广,更重要的是以本国语言为载体,传播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使本国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借以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

纵观国外的语言推广发展状况,可以发现这样两点共识:一是各国普遍将本民族语言教育的国际化纳入其强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将语言教育和文化推广相结合是发达国家向外传播自己的语言时所采取的一个基本政策。英国文化委员会、法语联盟、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等借助语言国际教育在各国人文外交中逐步声名鹊起,在全球范围建立了语言教学、教育文化交流、国际服务等分支机构,以促进文化、教育、国际关系的拓展和交流。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语教育承前启后,日渐由零散走向系统,展现出全新的局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国际汉语教育也被赋予新的历史内涵,成为中国语言文化传播和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国际汉语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它以国际汉语学习者为中心,研究国际汉语学习者汉语学习的理论和实践,国际汉语教师的专业发展途径与特点,国别化汉语教育的课程、教材、教法,国际汉语教育所涉及的各种教育测评问题,不同国家的语言国际教育之对比,以及国际汉语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等。较之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国际汉语

教育所研究的对象和规律,拓展到教学方法之外的教育学诸多分支领域,研究问题的转变带来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重大转变,学科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

国际汉语教育学科既要分析总结国际汉语教育的实践和现象,也要研究在跨语言文化背景下的国际汉语教育的理论和规律,探索汉语国际传播的机制、路径、策略和手段,因此,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计算机科学等都进入了国际汉语教育学科的研究视野。

首先,国际汉语教育以汉语教学为载体,因此必须在汉语语言学理论上研究作为外语或二语的汉语本体的特点、结构和功能,它一方面可直接为国际汉语教育服务,另一方面又可加深我们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促进汉语的本体研究的深入发展,因而汉语语言学和汉外语言对比成为学科重要基础理论之一。

第二,国际汉语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因此就必须遵循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并针对国际汉语教育的实际需求,确立教育教学的具体原则和方法,使国际汉语教育既体现出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的阶段性,又体现出本学科的性质和特点,这些都与教育学及其各分支学科密切相关。

第三,国际汉语教育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育,涉及国际汉语学习者的生理、情感、认知因素,学习迁移、学习策略、交际策略等,也涉及国际汉语教师的心理素质、职业道德修养和职业发展规划等,这些都与心理学及其各分支学科有密切关系。

第四,国际汉语教育对象学习汉语的过程,实质上是跨越自己的母语文化学习另一种语言文化的过程。国际汉语教育要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力,实际上是跨文化的交际能力。交际能力中所包括的社会语言能力、话语能力和策略能力,均与文化有关,因而国际汉语教育需要以文化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为指导。

第五,国际汉语教育本质上也是语言文化的国际推广和传播过程,传播学研究人类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研究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因而国际汉语教育需要以传播学理论作为指导,以提高汉语文化教育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六,国际汉语教育作为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需要以国际关系学及公共外交理论作为指导,研究如何通过汉语文化国际教育机制体制和区域化国别化策略,提升汉语与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丰富中外人文交流的内涵,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其他国家的民众并形成国际舆论,在国际上树立中国良好的形象,进而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

国外在语言国际教育领域的成果与经验,对我国国际汉语教育的学科建设发展具有诸多启发和借鉴意义。事实上,我国学界已经或正在把国外语言国际教育的理论和经验引入国际汉语教育的实践与科研之中,在借鉴国外语言国际教育相关理论和经验的同时,努力探索符合汉语与中国自身特点的国际汉语教育之路。

汉语教学是汉语国际教育的载体和支撑。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主要难点是什么？如何降低汉语学习的门槛，帮助外国人更快更好地掌握汉语，这是我们在汉语国际教育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作为汉语教学的母语国，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于对外来模式的借鉴，必须具有国际领先和模式输出意识，必须首先建立自己的有说服力的品牌。在汉语教学国际化进程中，掌握制定规则、输出规则的主动权，这是决定我们能够引领国际汉语教育潮流的重要之举。

为此必须进一步促进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理论的深化和教学实践的创新，在借鉴、吸收世界第二语言教学经验和成果的同时，应着重从汉语内在的特征和自身规律出发，建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基础理论。一是进行针对外国学习者的汉语本体研究，侧重点是教学中的难点以及汉语跟学习者的母语或第一语言的差异，并结合学习者的认知心理和语言习得以及跨文化交际等对汉语进行多角度综合研究；二是进行汉语第二语言的学习理论与教学理论的研究，包括习得理论、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的研究；三是进行针对教学实践和解决遇到的瓶颈问题的研究，包括教学案例、课堂教学设计、教学管理、测试评估、语料库建设、教材编写、师资培训、现代教育技术等研究与推广。

由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共同策划推出了《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系列丛书。该系列丛书收录了当今国际汉语教育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作了编排。值得一提的是该丛书还邀请包括两岸知名学者在内的海内外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赐稿或参与点评，共同探讨国际汉语教育的热门话题，体现了两岸和海内外学者跨学科的协同创新。

我们衷心希望本套系列丛书的出版，能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添砖加瓦，也为推动两岸国际汉语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协同创新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一点应有的贡献。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由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4
第三节 文献综述总结和问题的提出	22
第四节 研究方法	24
第五节 创新之处	25
第一章 泰国华文教育的历史沿革	26
第一节 华文教育与国际汉语教育	26
第二节 泰国华文教育历史沿革与发展	27
第三节 泰国汉语教育政策与规划	38
第二章 泰国汉语教育现状	41
第一节 泰国汉语教育现状实地调研	41
第二节 泰国汉语学校现状和问题	45
第三节 泰国汉语学生现状和特点	49
第四节 泰国汉语教师现状和问题	57
第五节 泰国汉语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的现状和问题	64
第六节 泰国汉语教材现状和问题	71
第七节 泰国汉语教学方法现状和问题	85
第八节 泰国汉语教学测试现状和问题	88
第九节 泰国汉语教育中的资源支持	90
第三章 泰国汉语教育规划框架	96
第一节 实施主体	96
第二节 教学对象	97
第三节 教学师资	100
第四节 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	105
第五节 教学材料	109
第六节 教学方法	115

第七节	教学测试	118
第八节	资源支持	121
第九节	泰国汉语教育规划框架	126
第四章	学生视角下泰国汉语教育	130
第一节	研究设计	130
第二节	数据分析	133
第五章	对泰国汉语教育发展的建议	156
第一节	实施主体发展建议	156
第二节	基于泰国汉语学生特点的教学建议	158
第三节	汉语教师发展建议	161
第四节	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发展建议	168
第五节	汉语教材发展建议	172
第六节	教学方法发展建议	176
第七节	教学测试发展建议	179
第八节	对资源支持的建议	181
结论		184
第一节	泰国汉语教育现状	184
第二节	泰国汉语教育规划框架	186
第三节	对中国在泰汉语教育传播和推广的建议	188
第四节	对泰国汉语教育规划和发展的建议	190
第五节	未来研究展望	192
附录		194
附录一	泰国汉语教育情况调查——教师问卷	194
附录二	泰国汉语教育情况调查——大学生问卷	198
附录三	泰国汉语教育情况调查——中小学生问卷	203
附录四	问卷四	205
附录五	测试卷	210
附录六	访谈名单	216
参考文献		219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

近年来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发展,中国政府加大汉语推广的力度,越来越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语言、文化乃至中国方方面面产生兴趣,纷纷加入学习汉语的热潮中。泰国和中国历史渊源深厚、地缘相近、血缘相亲、经贸往来频繁,汉语在泰国普及和推广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截止2012年底,全泰国共有1800多所中小学和大学开设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将近90万。^①另外,泰国目前共建有12所孔子学院,11所孔子课堂,同时也是全世界接受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最多的国家。

泰国汉语热被普遍认为是世界汉语热的典型。泰国汉语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泰国人对汉语认同度之高,都是人们没有预料到的(吴应辉、杨吉春,2008)。从东南亚乃至整个世界的汉语推广事业来看,泰国的汉语教育和汉语推广都具有典型意义,所以更具研究价值。泰国的汉语教育^②在20世纪中期遭遇两次严厉禁限,华文教育人才断层、缺乏,尤其是高层次的研究型人才更是寥寥无几。近几年来这种情况因为中泰两国的汉语教学和研究人才往来较为频繁而有所改善,泰国汉语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不少研究成果:一部分研究成果来源于赴泰进行汉语教学的教师志愿者、公派教师等,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研究背景以及在泰汉语教学实践经验开展的研究;另一部分研究成果则来自于来华攻读硕博学位的泰国学生毕业论文,他们出于专业的需要和便利的自身条件,以泰国汉语教育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作为毕业论文发表。但是从研究成果上来看,单篇论文研究较多,成书著作研究则很少;微观研究居多,宏观研究则比较缺乏;调研研究居多,理论探讨较少;另外研究成果的优劣则因为研究者自身水平的限制和对泰国的了解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别。毋庸置疑,现有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研究泰国汉语教育现状,但是泰国汉语教育相关的宏观研究和

^①此数据在泰国民教委 Ms. Sireethorn Benchangkappasert(赖芝华女士)和基教委 Ms. Uthaiwan Chalermchai(吴泰湾女士)提供数据的基础上,参考泰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员会合作策略局2010年统计数据和中国国家汉办驻泰代表处《志愿·青春·泰国——赴泰汉语教师志愿者必读》(2012:8)书中数据统计而得。四种来源的数据如有出入,原则上以泰国教育部提供的数据为准。

^②泰国华文教育在1992年汉语解禁后逐渐失去了原本母语教育和侨民教育的特性,嬗变为第二语言教学。本文以1992年为分界线,1992年以前称为华文教育,1992年之后则称为汉语教育。

理论研究都有待深入。

近十年来泰国汉语教育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04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汉办制定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2003年至2007年的发展规划》——《汉语桥工程》。《汉语桥工程》明确提出了“集成、创新、跨越”作为汉语对外教学和国际传播工作的发展战略,也就是:集成一切资源要素,采取创新的举措,实现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跨越式发展(章新胜,2007)。具体内容包括:加快建设海外孔子学院、大力发展多媒体音像汉语教材、加强对外汉语师资建设和加速推广汉语水平考试等内容。^①正是因为当年的《汉语桥工程》提出集成一切资源要素,采取创新的举措,才有了后来“实现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思想”和“加快海外孔子学院、大力发展多媒体音像汉语教材、加强对外汉语师资建设和加速推广汉语水平考试”等具体发展措施。国家汉办在泰国汉语教育的资金投入、汉语教师输入和泰国本土教师培养、教材研发和赠送、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成立与建设等方面给予巨大的支持和帮助,极大地促进泰国汉语教育在21世纪初顺利完成复苏并走向发展。

除了中国政府的支持之外,泰国政府和相关部门也调整相应的政策为泰国汉语教育复苏发展提供稳定良好的环境。1992年泰国汉语解禁之后,泰国政府和相关部门逐步认识到汉语的交际作用和“提高国家战略竞争力”作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汉语教育相关的政策,如2006年《促进汉语学习,提高国家战略竞争力规划(2006-2010年)》、《2010年高等教育促进汉语教学战略方案》等。这些政策都是从国家层面和国家战略发展角度对汉语教育做出具体的政策指导和规划制定。国家汉办的国际汉语推广和国际汉语传播规划与泰国汉语教育政策和规划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共同促进泰国汉语教育的发展。可见,泰国汉语教育的发展不仅应该从汉语教育本身研究如何提高汉语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还应该从国家相关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角度研究如何对汉语教育进行良好的引导和促进。

语言政策的实施和语言的推广、发展都离不开语言规划。国内外对于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研究包含理论研究和国别化、区域化(地区化)实证研究。理论研究主要包括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区别与关系、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连贯性与系统性、语言文字立法、语言信息化、网络时代语言规划等。国别化、区域化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也是近年来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的重要内容。不少国外研究者致力于研究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而且将这类研究做得相当认真和细致。这些研究丰富了国别化和区域化的语言政策规划研究,值得肯定和借鉴。中国国内的区域化(或者地区化)研究主要集中于藏、蒙、新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和港澳等地区的双语或多语的研究;对于教育领域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研究更多集中于语言规范、普通话推广、双语教学和语言信息化处理等方面。

教育领域的语言规划,最早由Cooper提出。Cooper(1989:157-163)认为语言规划除了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之外,还应包含习得规划(Acquisition Planning)。Kaplan和Baldauf(2003:202)在习得规划的基础上发展出语言教育规划(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

^①史利. 中国启动汉语桥工程教育[EB/OL]. <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5/2005-06-15/26/586955.shtml>, 2005-6-15/[2013-3-4].

cation Planning)理论。语言教育规划包含七项语言政策规划形式目标和四项培育规划功能目标。七项语言政策规划形式目标为教学对象(Access Policy)、教学师资(Personnel Policy)、课程目标(Curriculum Policy)、教材教法(Methods & Materials Policy)、资源支持(Resourcing Policy)、社区参与(Community Policy)和测试评估(Evaluation Policy);四项培育规划功能指目标语言再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语言维护(Language Maintenance)、外语/二语(Foreign /Second Language)和语言变迁(Language Shift)。Kaplan 和 Baldauf(2003)两人用这一理论框架分析日本、瑞典、朝鲜、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美拉尼西亚群岛的语言教育规划,透过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规划的研究,较为整体和全面地了解整个太平洋圈的语言和语言教育规划。魏芳(2010)在其博士论文中继续使用该理论框架,从制定政策和实施规划主体、规划主体对外语的态度、外语教学的语种设置、教学对象、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法和教材、课程评估方式以及师资情况等方面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高校大学外语教学教育政策进行考察和分析,总结这些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特点,并与美国、新加坡和日本的大学生外语教育政策进行对比,分析归纳出中国大学外语教育政策中所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深化发展中的大学外语教学改革提出建议。李雯雯和刘海涛(2011)强调语言规划则是政府职能,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而语言教育规划是涉及语言的教与学,只与教育部门相关。他们采用了Kaplan 和 Baldauf 的语言教育规划理论框架中的课程设置、教师培训、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资源投入和测试评估五个方面,分析近年来日本英语教育发展和英语教育政策的变革。上述数位研究者或直接采用Kaplan 和 Baldauf 的语言教育规划理论,或是稍作取舍地对某一国家或地区教育领域的语言规划进行分析。但是研究者并没有就自己采用该理论框架时所做取舍的原因和依据进行说明,也还未对语言教育规划和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各国语言教育情况不尽相同,在泰国汉语教育现状调查的基础上考察泰国汉语教育规划,并提出泰国汉语教育规划框架,基于泰国汉语教育的实际情况补充和发展语言教育规划理论。检验教育领域语言规划效果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考察该规划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因此本文也将尝试从学生角度探讨泰国汉语教育规划对泰国汉语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关系并依此提出改进建议。

汉语教育在今天的泰国,已经不再是传统带有母语教育色彩的华文教育,而是外语教育,更准确来说是第二外语教育。同时,汉语在泰国也是一门缺乏系统深入研究和规划的外语。考察与泰国教育和规划有关的研究结果发现:大部分研究还较为松散,且更多地集中于点上的微观研究,而宏观方面的研究因为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等原因,较少研究者涉及此类研究。但是泰国汉语学生具有什么特点;教师师资需要什么资质,如何进行培养和培训;什么样的教材和教学方法更适合泰国学生;是否有必要设计出适合泰国教学实际的教学大纲,如何设计;怎么样的课程设置才合适且合理;泰国现有汉语测试是否符合泰国汉语教育实际;是否有必要研发泰国汉语水平考试;中泰两国政府在泰国的汉语教育的资源支持以及华人参与在泰国汉语教育中扮演什

么样的角色,学生学习汉语的资金投入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有助于细化泰国汉语教育规划,对提高泰国汉语教育效果大有裨益。概言之,泰国汉语教育现状研究和规划研究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本研究将基于泰国汉语教育现状与特点,从泰国国情和泰国汉语教育实际情况出发,结合第二语言教学和二语习得等相关理论,将 Kaplan 和 Baldauf 语言教育规划的七项形式规划目标发展成为更符合泰国汉语教育实际的泰国汉语教育规划框架,进一步从学生角度探讨泰国汉语教育规划框架与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关系。本研究最终目的在于综合以上研究,为泰国汉语教育发展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策略,同时也为中国的汉语教育推广、传播和泰国汉语教育发展提出建议。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语言教育规划理论综述

1. 语言规划相关研究综述

学界普遍认为 Language Planning 一词最早是由语言学家 Einar Haugen 提出,但是 Einar Haugen(1965)本人却表示 Uriel Weinreich 才是最早使用该词的人,他只是将该词写入论文并发表于学术界。Cooper(1989:29)曾经对 Language Planning 一词的来源做了更详细的阐述:在 Language Planning 出现之前,其实还有 Language Engineering、Glottopolitics 等词被用来表示“语言规划”的意思。1959 年,Haugen 的《在现代挪威规划一种标准语言》(Planning for a Standard Language in Modern Norway)一文中提到 Language Planning(语言规划)一词并做定义:语言规划是一种准备规范的正字法、语法和词典的活动,旨在指导非同质言语社区中的书面和口头语言应用(Cooper,1989:29;刘海涛,2006)。后来 Haugen 对这一定义做了修正,认为上述的行为都是语言规划的结果,是实施语言规划制定者所制定的规划,而不是语言规划的全部(Cooper,1989:29)。Cooper(1989:31-45)在《语言规划与社会改变》(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一书中考察了 12 种语言规划的定义,总结出语言规划主要考虑的是“谁为谁做什么规划和如何规划”(Who plans what for whom and how),并给出自己对语言规划的定义:语言规划指的是有意识去影响他人语言行为的努力,包括习得、结构和功能分配等方面。Kaplan 和 Baldauf(1997:3)则认为语言规划是某些人由于某种理由试图改变某个社区语言行为的活动。Cooper 和 Kaplan、Baldauf 在对语言规划的定义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歧,都认为语言规划是有意识的目的行为,是为了影响和改变他人乃至整个社区的语言行为。虽然两个定义都没体现语言规划的制定主体,但是作为语言政策的实施阶段,语言规划的主体同语言政策制定的主体一样还是政府和权威人士。所以,语言规划是政府或权威人士为了影响和改变他人的乃至整个社区的语言行为而进行的有意识的活动和行为。

Kaplan(1993/1994a:3)认为“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在二十世纪并没有得到重视,甚至是二十世纪的后二十年,全世界关注这一领域的专家和研究者只是少数几个,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在大学里仅仅是附属于社会语言学学科下面的几堂随意讲座,甚至造成一种误解,认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只是国家或者政府层面考虑的问题,与个人和其他单位团体无关”。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真的只是国家政府的问题,与个人无关吗?事实恰恰相反,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政策、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双语政策、多语政策等的相关措施,都与百姓语言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除了 Kaplan 和 Baldauf 之外,不少研究者也开始逐渐意识到语言规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有研究者致力于各国和地区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国家的语言政策与规划(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如澳大利亚(Egginton, 1993/1994)、美国(Ruiz, 1993/1994)、南非(Webb, 1993/1994);双语政策或多语政策与规划:加拿大(Edwards, 1993/1994)、香港(Johnson, 1993/1994)、南美(Hornberger, 1993/1994)、西欧 Beardsmore, 1993/1994)和纳米比亚(Haacke, 1993/1994);土著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新西兰(Kaplan, 1993/1994b)和墨西哥(Patthey - Chavez, 1993/1994)等。当然,每个国家和地区语言政策和规划往往是多样化的:一个国家既可以实行国家语言政策和规划,也可以实行双语政策甚至是多语政策,两者可以共同存在。以加拿大为例,英语和法语都是其官方语言,加拿大最重要的语言政策是双语政策和多文化主义,而魁北克省的法律法规旨在支持该省的法语政策。另外,在国别化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领域中,Kaplan 和 Baldauf 于 2006 年前后编辑出版了一套《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丛书》,全套共 8 本,介绍了亚洲、非洲、拉美、非洲、太平洋等地区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通读全套书,可以大致了解整个世界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除了介绍国外一些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规划之外,也有研究者(周玉忠、王辉,2004;陈章太,2005;李宇明,2005)关注理论方面的研究;而应用研究方面,国内研究者主要集中于少数民族语言地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语言文字立法、普通话推广、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语言信息化处理等方面的研究。

在语言规划的分类上,Kloss 和 Verdoodt(1969)^①认为应区分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作为自主语言系统的语言,一种是作为社会制度的语言,即语言规划应分为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和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两个术语也开始由 Kloss 和 Verdoodt 引入语言规划理论。在此之前,Haugen(1966)提出 2 * 2 矩形框架,对纷繁复杂的语言规划形象进行梳理和规范,这一过程蕴含了 Kloss 和 Verdoodt 区分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的理念。1983 年,Haugen 又对该框架进行修正和补充,作出更全面的阐释。Haugen 的 1983 年修正框架奠定了语言规划理论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赵守辉,2008)。

①转引自赵守辉. 语言规划国际研究新进展——以非主流语言教学为例[J]. 当代语言学. 2008, (2): 122-136.

表 1-1 Haugen (1983) 的修正框架^①

	形式(政策规划)	功能(语言培育)
社会 (地位规划)	1. 选择(决策过程) a. 问题的确认 b. 规范的分配	3. 实施(教育推广) a. 改正 b. 评估
语言 (本体规划)	2. 符号化 a. 文字系统 b. 语法系统 c. 词汇系统	4. 精细化(功能发展) a. 术语的现代化 b. 文体的发展

对于语言的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的内容, Kaplan 和 Baldauf (1997:39-49) 认为语言的本体规划应包含语言的词典编辑、标准化和精致化, 而语言的地位规划则指国家关于语言的决策和选择以及传播所选语言的活动。李宇明 (2008:2) 认为语言地位规划还包括确定语言(包括文字)及其变体的社会地位, 以及不同场合应该使用什么语言等。本文认同 Kloss 和 Verdoodt 的说法, 语言本体规划关注的是语言本身和语言内部结构的原则, 而地位规划是为改变语言或语言变体的使用和功能所付出的努力。

在 Kloss、Verdoodt 和 Haugen 的基础上, Cooper (1989) 将语言规划的分类扩展为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 Haarmann (1990) 提出声望规划 (Prestige Planning)。习得规划是与语言教学密切相关的领域, 着重于如何发展语言教育。声望规划是为了使语言能力在重要或有威望的情境中能够充分体现而建立相关的语言政策并鼓励专门语言形式的使用。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是一种能产性的活动, 声望规划则是“一种接受性(或价值)功能, 它会影响本体和地位规划是如何被规划者执行的, 又是如何被受众接受的”(刘海涛, 2006)。Kaplan 和 Baldauf 在 Haugen 和 Cooper 的基础上, 提出了“以目标为导向的语言规划框架”(简称语言规划框架):

表 1-2 Kaplan 和 Baldauf 的“以目标为导向的语言规划框架”
(Kaplan & Baldauf, 2003:202)

方法	政策规划(形式上)	培育规划(功能上)
地位规划 (关于社会)	地位标准化 ●官方化 ●国家化 ●非法化(语言的禁止或剥夺)	拯救 ●再生 ●复兴 ●恢复 维护 语际交流 ●国家间语际交流 ●民族间语际交流 ●传播

^①转引自赵守辉. 语言规划国际研究新进展——以非主流语言教学为例[J]. 当代语言学. 2008, (2): 122-136.

续表

地位规划 (关于语言)	语言规范 ●文字 ●语法 ●词汇 辅助语码规范 ●文字 ●语法 ●词汇	地位 词汇现代化 语体现代化 改革 ●净化 ●改革 ●语体简化 ●术语统一 国际化
语言教育规划 (关于学习)	政策发展 教学对象 教学师资 课程设置 教学和教材 资金投入 社区参与 测试评估	语言习得规划 语言再习得 语言维护 外语/二语 语言变迁
声望规划 (关于形象)	语言推广 ●官方/政府 ●机构 ●利益集团 ●个人	知识化 科学语言 专业语言 雅文化语言

在这一框架当中可以看到, Kaplan 和 Baldauf 将 Cooper 的“习得规划”发展成“语言教育规划”(Language - in - education Planning)。Kaplan 和 Baldauf(2003:6)认为语言教育规划同本体规划、地位规划和声望规划一样,都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类型之一。但是,语言教育规划主要专注于语言教育领域,与语言政策的制定、语言教学大纲和课堂教学相关,旨在探索语言政策同教学思想、目标、内容、教学等方面的关联,以及如何在教育领域内实现这些目标。赵守辉(2008)对这个框架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个综合框架,是对众多语言规划(包括他们自己^①1997年的著作)框架和模型的最全面的概括和总结……使语言规划最终获得理论上的完善,拓展了人们的视野,标志着学科体系的成熟,相信对今后的语言规划实践和学科建设将产生深远影响。”

2.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关系研究综述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也被称为语言政策规划,英文则是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LPP)或者是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LPLP)。在大多数的文献当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并没有做详细的区分(刘海涛,2006),甚至两者通用。魏芳(2010:2-4)认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在多数情况下是同义词,但是总的来说,语

^①指 Kaplan 和 Baldauf 两人。

言政策是社会政策的一部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长期行为;语言规划则是个人、社会团体或政府为实现语言政策的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是语言政策的实践过程。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两者应严格区分:Cooper(1989:29)考证语言规划一词来源的时候提出,虽然有时候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是同义词,但是更多的时候,语言政策是语言规划的目标。Baldauf(1993/1994:82)提出应区分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他认为语言规划是语言政策的实施阶段。Kaplan 和 Baldauf(2005:958)认为语言政策是集思想、法则、规则和实践于一体,试图按规划改变社会中所使用的语言,而语言规划则关注的是这些政策的施行。郭熙(2004:275-280)详细论述了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关系:语言规划通常是语言政策的体现,有关当局从社会或自身的需要等出发,确定自己的语言政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语言进行规划。语言政策直接影响语言规划,同时语言政策的提出也要以语言规划理论为原则。胡文仲(2001)则是通过施行者来区分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他认为语言政策是政府行为,且多为长期决策;语言规划的施行者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民间专家,长、中、短期决策均可。本文比较认同 Baldauf 的看法,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有所不同,语言规划是语言政策的实施阶段。为实施制定好的语言政策,做出相应的语言规划并付诸实践,构成了整个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过程。

3. 语言教育规划理论研究综述

Cooper(1989:160)认为习得规划主要关注语言教育推广而不关注语言本身及其运用,且习得规划和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一样,包含了规划主体、过程、对象、目的、所处的社会环境、方式、效果和评估等。Ingram(1989)把语言教育同第二语言(或是外语)教学等同起来,他认为识字能力和双语教学是语言教育的主题,同时他也建议语言教育规划只关注语言政策如何制定才能实现。两位研究者对于习得规划(语言教育规划)的理解都略显片面。Baldauf(1990)通过论述语言规划和教育之间的关系,认为教育在大多数语言规划场景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语言教育规划则是教育领域的规划。Paulston 和 McLaughlin(1993/1994)也认同语言教育规划应包括教育领域的所有规划。

前文提到 Kaplan 和 Baldauf 将 Cooper 的“习得规划”发展成“语言教育规划”,与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声望规划三者平级。Baldauf 和 Ingram(2003)认为虽然语言规划框架包含地位规划、本体规划、语言教育规划和声望规划,其中的语言教育规划往往是实现语言改变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因此,语言教育规划在整个语言规划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赵守辉(2008)认为语言教育规划研究是属于微观规划研究,而微观规划的研究是近年来国际语言规划研究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从 Kaplan 和 Baldauf 的语言教育规划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到,语言教育规划包含七项形式规划目标和四项功能规划目标。(Kaplan & Baldauf, 2003:202)七项形式规划目标分别为:教学对象、教学师资、课程设置、教材教法、资金投入、社区参与和测试评估。功能规划目标则为:语言再习得、语言维护、外语/二语习和语言变迁。从内容上来看,形式规划目标和语言教学本身直接相关,从规划和政策实施主体的角度出发,设定语言教育规划目标。功能规划目标更多的是从规划和政策的制定主体出发,探讨国家或者地区内所有语言教育相关的整体规划目标。对于具体海外的汉语教育

规划而言,主要考虑的是单一语言的语言教育问题,而与之关系相对较弱的四项功能规划目标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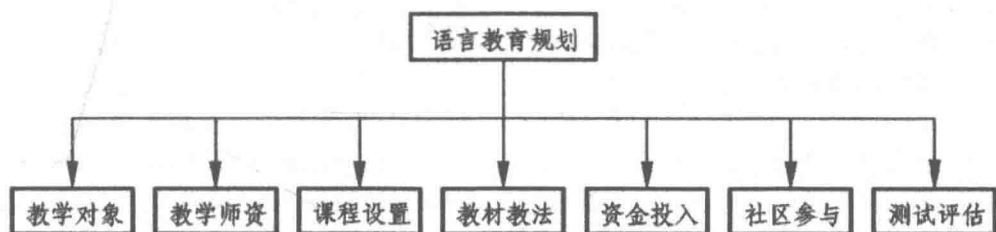


图 1-1 语言教育规划形式规划目标框架图

教学对象(什么人?学什么?什么时候学?)

教学师资(师资来源?如何培训?)

课程设置(语言教学的目标是什么?)

教材教法(什么阶段用什么教学方法和教材?)

资金投入(谁来偿付各项支出?)

社区资源(谁来担任顾问/参与其中?)

测试评估(评估与同教学目标相应的教法、教材的关系。)

这七项规划目标,几乎涵盖了语言教育的整个过程,是语言教育规划的形式目标,也是语言教育规划活动应该全面考虑的问题。它们的施行状况对语言教育政策能否取得成功有重要的影响。(Kaplan & Baldauf, 2005a: 1014) Kaplan 和 Baldauf 运用上述七项规划目标对日本、韩国和瑞典的语言教育政策规划做了详细的实证分析,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借鉴。但是 Kaplan 和 Baldauf 对日本、韩国和瑞典三个国家的语言教育规划的分析针对的是这些国家内几种主要的教育语言而非单一的外语教育,如日本的日语、英语;瑞典的瑞典语、德语、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等;朝鲜的朝鲜语、俄语、英语和汉语。而早在 2003 年, Kaplan 和 Baldauf 就已经编辑出版了《Language and Language - in - education Planning in the Pacific Basin》一书,介绍太平洋地区的语言和语言教育规划。书中提到日本、朝鲜,以及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美拉尼西亚群岛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和语言教育规划,但是该书并未提及泰国语言和语言教育规划的情况。

Kaplan 和 Baldauf (2005a: 1014) 也提到并不是所有国家的语言教育规划形式都要严格做到这七项目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取舍。Garrouste (2007) 认为应从课程设置、教师、教材、社区参与和测试评估五个方面来分析语言教育规划。Tibategeza (2009) 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采用 Kaplan 和 Baldauf 语言教育规划理论,从课程设置、教学师资、教法和教材、社区参与和测试评估五个方面来论述坦桑尼亚的语言教育规划,省略了其中的教学对象和资金投入两方面。魏芳 (2010) 使用该理论框架,从制定政策和实施规划的主体、主体对外语的态度、外语教学语种设置、教学对象、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法和教材、课程评估方式以及师资情况考察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高校大学外语教学教育政策。李雯雯和刘海涛 (2011) 采用 Kaplan 和 Baldauf 的语言教育规划框架